

琼州乡贤



海口市遵谭镇涌潭村明代五里官道上为三位进士乡贤所立的牌坊。 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

◀上接 B02 版

还有琼西，苏东坡谪居三年，与当地士子诗文唱酬，文气传扬至今。《琼台记事录》述评：“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，讲学明道，教化日兴，琼州人文之盛，实自公始”。苏东坡的《海外集》留下了他“与老书生良月佳夜，步城西，入僧舍，历小巷”的历史佳话。

同时，琼西郡县史志也留下了黎子云、王霄等人的乡贤师从苏东坡的历史传记，留下了符确、赵荆等名贤故事，留下了“野鹤进士”黄河清的传奇故事。看来，是名臣名宦培育与造就了海南英贤名士，是海南英贤名士的文化努力，两相结合推动了乡土社会进步。

五里官道，乡贤传奇

孤岛海南，辟处海外，天阻海隔，因而成了唐宋贬官的“海上囚笼”。从昔日的“鬼门关”到今日海南国际旅游岛，千百年来海南乡贤薪尽火传，呕心沥血，架设了穿洋越海的文化通道。明朝末年，为纪念三进士先后登第，官府在三位乡贤的故里修建“五里官道”。

那条始于龙华区遵谭镇坊门村的官道，经云庵直达卜宅，官道条石铺设，长有5里，宽约2米，宽阔平坦，路基厚实。修建五里官道，原因是三个山村出了三名进士。可想而知，当年官道新建，轰动四方，那种场景，激动人心，那受益村民是何等自豪。

追溯历史，偏僻山村出了三名进士，就像黑夜的夜空升起了三颗明亮的星星，那是郡县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。为表彰三名进士的旷世功名，乡绅商议，奖掖前贤，激励后学，他们的选择是捐资修路，修建一条贯通三个山村的石板路，作为永久纪念。

用修路的方式奖励前贤，鞭策后学，这是一种朴实的奖励，更是巨大的荣誉。这是一种具有积

极意义的文化褒奖，至今仍传为美谈。人们所谈的不仅仅是五里官道，更重要的是文化古道，是人杰地灵。有三名不同年代的乡贤，才有了这条贯通古今的官道。

云庵村林氏始祖元龙系南宋进士。立村以来，“世昌自五”，说的是自宋及元，林氏第五世祖首开科第，官任教谕，到第十世，林氏令人瞩目。至第十一、第十二、第十三世，遐迩蕃衍，科甲愈彰。自明至清，云庵村林氏发散千支万派，熙熙攘攘，人文蔚起。

明景泰五年（1454），林氏过琼第十代林杰考中进士，与丘濬同榜高中。当年，琼州知府曾立“表贤亭”，表彰他与丘濬、邢宥、薛远，并称“四贤俱发初巍科，接踵要路，猷为足以匡弼时政，风裁足以激浊扬清，文章足以补助道化，实琼人之师，海内之望也”。

宅念村曾氏，自宋末立村以来，亦耕亦读，人才鼎盛。第八代曾英，考中举人，第九代曾鹏，考中进士。明清两朝，曾家本支，二十余世，簪蝉蝉联，其间显贵贤良，名标志乘者，代不乏人，被琼州乡贤南京礼部尚书王宏海誉为“一年两捷报，四代五登科”。

明正德九年（1514），曾鹏科场夺魁，初任龙溪县令，曾鹏缓征

薄敛，百姓称道；升任刑部主事，执法不挠；任福建副使，断狱如神，官声载道；贵州任上独闯贼营，贼众俯首。郡守赞其“达以济世，退以安身，真乃神仙”；海瑞称赞“鹏为先辈，以为师法”。

坊门村何氏，始祖何兴系南宋进士，授朝议大夫。《琼山县志》载：南宋年间何兴遭谪琼，任雷琼副使，任满落籍琼山。何兴次子何一鹏，理宗宝祐元年（1253）中进士，居坊门村。历史记载，宋代坊门何氏二进士，加上明代何其义，坊门何氏，一门三杰。

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坊门何其义考中进士。初任知县，访贫问苦，惩处奸恶，心系学子，捐献薪俸，募集资金，兴建县城学宫。因为政绩突出，调任花柳繁华之县，依然冰清玉洁，节操自律。曾与许子伟合力，创办京城琼南会馆，琼州学子赴京甚得其便。

天下道路万千条，万千条路万千里，但这短短“五里石道”，具有非凡的人文价值。数百年来，人们对“五里三进士”津津乐道，实则是对古村乡贤，对乡贤文化津津乐道，是对振兴家乡，对教育子孙津津乐道。唯其如此，五里官道成了琼州历史的文化通道。



海口市国兴大道北侧的攀丹村是乡贤唐舟、唐胄等乡贤的故乡。 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

解读乡贤文化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“乡贤”，是历史名词，也是时下热词。

历史上的“乡贤”，原先是东汉时期封建王朝对文武官员中的“廉臣能吏”，或是对“德高望重”的社会贤达，在其过世之后赐予的一种“精神嘉奖”。

获得这种荣誉称号，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极高评价。这不仅是对享有者，对享有者的家族，而且对享有者的家乡，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。

自古以来，国人尚德敬贤，敬重有德有才的社会贤良。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记载，公元前178年，汉文帝下诏“二三执政……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，以匡朕之不逮。”汉武帝复诏举“贤良”，也称“贤良文学”。历汉而晋，历朝历代，诏举贤良，称为善政。

晋代李密，曾仕蜀汉。晋移蜀祚，晋武帝以其博览五经，孝亲敬祖，征召入宫。李密以祖母年老多病，无人供养，上表陈情，辞不赴任。相传，晋武帝阅后很受感动，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，并钦命郡县官吏供养李氏祖母，华夏历史因此留下“贤良”故事。

古代中国原是一个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。传统农村的组织架构，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的关系而长期存在。作为乡土中国的社会贤良，李密就是他们的偶像。他的奏疏《陈情表》以理动人，以情感人，成了乡贤文化中孝行天下的代表作。

蜀汉贤相诸葛亮，勤政爱民，宵衣旰食，日理万机。为兴复汉室，两次率师北伐，前后两篇《出师表》，情意真切，言辞委婉。他规劝后主，广开言路，严明赏罚，亲贤远佞；同时表达自己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决心。诸葛亮是两朝老臣，忠贞不渝，以身许国，魂断疆场。李密则“祖孙二人，相依为命”，祖母有幸尽其天年。解读乡贤文化，后人留下了“读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不流泪不忠，读李密《陈情表》不流泪者不孝”的感慨。

李密孝亲，感动晋武帝；诸葛亮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范仲淹出将入相，功满天下。仁人志士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种高尚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。难怪朱熹称范仲淹是“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”。

范仲淹幼年家贫，求学“划粥割菹”，当官后俸禄虽厚，但仍克勤克俭，毕生“未曾

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”，省下余资“置义田，兴义学”，解族人困，促学子读书。一代名相，清贫如洗，无资葬埋。韩琦含泪祭祀，称誉他“前不愧于古人，后可师于来哲。”

北宋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直言朝政，痛斥时弊，陈“十事疏”，主张推行法制，整顿吏治，加强武备，巩固边关，减轻徭役，扶助农桑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虽然，范公有功社稷，有益民生，但却因此触犯权贵而遭贬谪，梅尧臣作《灵乌赋》劝他缄默，范仲淹答以《灵乌赋》表示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表现了旷古名贤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。

南宋陆游，自幼立志报国，始终坚持抗金，屡遭排斥打击。在抚州任上，春旱秋涝，灾情严重，百姓饥困，陆游因“拨义仓赈济，檄诸郡发粟以予民”而遭贬。晚年退居乡里，仍然念念不忘“遗民泪尽胡尘里，南望王师又一年”，仍然念念不忘收复中原，最后留下“死去原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悲叹。

不管是李密、诸葛亮，还是范仲淹、陆游，他们所言所行，所代表的是古代贤大夫的精神风骨和道德情操。他们是国家栋梁，他们是乡村贤达，宋代张横渠为此做了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高度概括，是他们的共同理想。这就是历史文化，传统乡贤文化，是几千年来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极可贵的道德文化。

乡贤感人，但乡愁难熬。唐代诗人崔颢，登楼眺望，乡愁袭来，忧思顿生，不禁长叹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？家乡遥远，烟波迷茫，不由使人想起刘皂“客舍并州已十霜，归心日夜忆咸阳”。是啊，十年羁宦，日夜想家，“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

乡贤是乡人，是古代的乡村人。虽然乡贤文化难免乡愁笼罩。但它曾为乡土社会稳定、中华文明传承起过重大作用，产生积极影响。历史并没有忘记他们，即便是没有显达的乡贤，他们也以其特有的文化良心，维持乡土社会礼仪秩序，教化邻里，造福一方。

传统乡村不是僵化村落，而是有故事的心灵家园。可是，现代都市像强力磁铁吸走了乡村精英。乡贤走远了，好在“创新乡贤文化，弘扬善行义举”发出了召唤。为此，解读乡贤文化，弘扬乡贤精神，书写乡贤传奇，抒发乡土情愫，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。